

平埔原住民與漢人通婚的 歷史人口分析(1905-1945)

葉高華 *

本文藉由歷年人口動態統計與 8 個平埔村落(涵蓋噶瑪蘭、道卡斯、巴宰、西拉雅、馬卡道等族)的戶口檔案，分析 1905-1945 年間平埔原住民與漢人相互通婚的比率。從全島層次來看，只有極低比率的漢人與平埔原住民通婚：福佬人不到 0.5%、客家人不到 1%。平埔原住民則有三分之一左右與漢人通婚。如此，跨族通婚可使漢人對平埔社群產生很大影響；平埔原住民對漢人社群的影響卻是杯水車薪。不過，由於各地人口結構與族群關係迥異，地方上的情況可能大異於全島層次所見圖像。從村落層次來看，各地通婚率差異很大，但仍有一定規律可循。在地方上相對人口規模愈小的群體，通常愈能接受跨族通婚。換言之，在平埔村落中居於少數的漢人，其通婚率高於全島水平甚多。本文也檢視若干被認為影響通婚的因素。結果顯示，彼得·布勞的結構理論可以解釋工業化之前的臺灣社會；鮑梅立提出的四個說法則不具普遍性。

關鍵詞：歷史人口學、族群關係、招贅婚、纏足

*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一、研究問題

(一)通婚有多普遍？

一位婦人見我輪廓深邃，問我是哪裡人，得知我是吉貝耍人，她笑著說：「原來是番仔囝！」¹

村中的人對於別人稱我們為「番仔」相當反感，認為外面的人都是亂講的，甚至忌諱「番」這個歧視性字眼，所以只要福佬話中有「番」字的物品名稱，在吉貝耍都有與眾不同的說法。²

吉貝耍位於臺南市東山區，是一個以西拉雅族蕭壠社後裔為主的村落。從段洪坤的自白來看，在他小時候的 1970 年代，附近居民還很清楚吉貝耍人是「平埔番」，甚至以此嘲笑他們。與此構成強烈對比的是，吉貝耍人拒絕承認自己是「番」，甚至拒絕使用任何涉及「番」的字眼。1991-1992 年，人類學者鮑梅立(Melissa Brown)來到吉貝耍、隆田(舊名番仔田，位於官田區)、頭社(位於大內區)等三個西拉雅村落(位置見圖 1)做田野調查時，當地人仍然矢口否認自己是「平埔番」。直到她無意間詢問：「你的母親或祖母有沒有纏足？」當地人突然脫口而出：「阮番仔無縛跤！(gun hoan-a bo pak kha)」。³於是，鮑梅立改以迂迴的方式詢問父母與祖父母的事情。老年人大多可以說出過去當地有平埔原住民的歷史，但是只要談到自己就顧左右而

1 段洪坤，〈當代平埔原住民族運動研究(1993-2012)：以臺南西拉雅族為例〉(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頁 90。

2 段洪坤，〈當代平埔原住民族運動研究(1993-2012)〉，頁 1。

3 按「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gún hoan-á bô pāk-kha。

言他，甚至直接說自己是福佬。⁴

這樣的情況，到了 1990 年代以後起了驚天動地的變化。隨著臺灣人認同崛起，「平埔族」的標籤突然從污名變成「臺灣人有別於中國人」的證明。「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說法風行一時，即使這句話在清代與日本時代的文獻中都找不到記載。⁵許多人開始主張自己擁有平埔族血統。主要說詞是：清代實施海禁，不准漢人女性來臺，因此來臺的漢人男性只能跟平埔族女性通婚、生育下一代。結論是：多數臺灣人不是純種漢人，而是漢人與平埔族混血的後代。⁶更極端的一派甚至主張多數臺灣人是漢化的平埔族，連混血都沒有。主要說詞是：清軍攻取臺灣後就把漢人都趕回大陸，接著實施海禁，因此沒

4 Brown, Melissa, *Is Taiwan Chinese? The Impact of Culture, Power, and Migration on Changing Ident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69.

5 收錄逾十萬筆清代檔案全文的「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310 種史料全文的「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四千三百餘條臺灣俗諺的《臺灣俚諺集覽》，皆遍尋不著任何與這句話相似的文字。這句話的出處成謎。見：臺灣總督府，《臺灣俚諺集覽》(臺北：臺灣總督府，1914)。

6 這類說法在民間廣為流傳，只要在網路上搜尋「平埔血統」、「唐山媽」等關鍵詞，就可以找到一大堆傳播者。這些傳播者大多不是專業學者，也不是以學術著作的形式傳播，故本文不一一指名道姓。關於這類說法的起源與傳播過程，可另文分析。本文重點不在於此，僅摘要其主要說詞。值得一提的是，這類說法在強調海禁的同時，絕口不提清政府也禁止漢人與原住民通婚。按《大清律例》戶律婚姻門第一百一十七條「嫁娶違律主婚媒人罪律」之條例二：「福建、臺灣地方民人不得與番人結親，違者離異，民人照違制律杖一百，土官、通事減一等，各杖九十，該地方官如有知情故縱，題參交部議處。其從前已娶生有子嗣者，即安置本地為民，不許往來番社，違者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此條例係乾隆二年(1737)定例，光緒元年(1875)沈葆楨奏準刪除。見：薛允升著述、黃靜嘉編校，《讀例存疑重刊本》第二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頁 314。

幾個漢人來到臺灣。⁷不過，這種極端的說法連血液專家林媽利也無法背書。

近年來，林媽利不斷透過媒體宣稱 85% 以上的臺灣人擁有原住民基因。不過，她的數據也無法否認臺灣人與福建、廣東人群在基因上的相似性。於是她稱呼福建、廣東人群為「越族」，藉以撇清臺灣人與漢人的關係。如此，多數臺灣人是「越族」與平埔族混血的後代。⁸即使林媽利的說法受到體質人類學家陳叔倬質疑，⁹但獲得許多臺獨基本教義派人士歡迎。如李筱峰興奮地為林媽利的書《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寫了推薦序：「國共兩黨以後還要罵我這個臺獨份子『漢奸』的話，我可以更理直氣壯回答：我不是漢人，我哪有資格當漢奸！」¹⁰

關於混血比例的問題，留給生物醫學與體質人類學的專家去爭辯。本文僅檢視其基本預設：來自福建、廣東的人群(文化上的漢人，稱為越族後裔亦無妨)普遍與平埔原住民通婚。這個預設堅實嗎？在史料中，確實能發現一些證據，特別是 1874 年以前不受清政府直接統治的恆春地區。¹¹ 1909 年恆春廳的調查報告指出：「散住於射麻裡庄(今滿州鄉永靖，見圖 1)及其附近的廣東人、福建人與平埔番，因互相通婚，故無系統，

⁷ 同樣的，這派說法也在學術界以外流傳甚廣；本文僅摘要其主要說詞。這派說法可避免混血說的禁令悖論：清政府禁絕漢人女性來臺，但不能禁絕原漢通婚。

⁸ 林媽利，《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臺灣各族群身世之謎》(臺北：前衛，2010)。

⁹ 陳叔倬、段洪坤，〈平埔血源與臺灣國族血統論〉，《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2 (臺北，2008)，頁 137-173；陳叔倬、段洪坤，〈臺灣原住民祖源基因檢驗的理論與統計謬誤〉，《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6 (臺北，2009)，頁 347-356。

¹⁰ 李筱峰，〈推薦序〉，收入林媽利著，《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臺灣各族群身世之謎》(臺北：前衛，2010)。

¹¹ 周婉窈，〈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新」材料與多元詮釋的可能〉，《臺灣風物》，65:2 (臺北，2015)，頁 23-89。

頗為混亂，也因此沒有像住於其他地方的平埔番能自成一社會的情況。地方居民也未有彼我的區別……」¹² 同一時期的臺北錫口(松山)與嘉義一帶，也有關於平埔原住民多與漢人通婚的報導。¹³

不過，在 19-20 世紀之交的臺灣，更常見到的敘述框架是：平埔原住民與漢人原本很少通婚，當時剛開始被接受。1896 年，伊能嘉矩踏查臺北近郊的北投社與毛少翁社(位於天母，見圖 1)。他提到：雖然與漢人通婚的例子不多，習俗與語言都已經被漢人同化。不過，「平埔蕃與漢人都認為他們不是同族」，「他們與漢人之間，還有一條明顯的界線。」¹⁴ 1909 年苗栗廳的調查報告指出：後壠社與新港社(位於後龍鎮，見圖 1，今歸為道卡斯族)「道光年間(1821-1850)尚嚴禁與外族通婚及收養關係，不准外族進入，然隨著與漢人之間交通接觸頻繁，雖少有背叛者，但社會制裁已稍見緩和，有默許之傾向。」¹⁵ 鯉魚潭(位於三義鄉，見圖 1)的巴宰族「結婚係番族互相嫁娶，鮮少與普通本島人通婚者，然亦不能謂全無。」¹⁶ 同一年，管轄(後來鮑梅立造訪的)吉貝耍、番仔田、頭社的鹽水港廳也向總督府提出報告：「領臺當時，婚姻等關係僅限於同族之間。然到如今，亦往往可見與福建人通婚者。」¹⁷

上述報導雖然可貴，但僅限於概括性的文字敘述，含糊籠統。幸好，1905-1945 年間的戶口檔案保存平埔原住民與漢人通婚的資訊，可精確統計其通婚率。往前看，清代缺乏如此詳實的戶口登記。往後

¹² 翁佳音、陳怡宏譯，《平埔蕃調查書》(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頁 150。

¹³ 翁佳音、陳怡宏譯，《平埔蕃調查書》，頁 102、131。

¹⁴ 楊南郡譯註，《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臺灣通信〉選集》(臺北：遠流，1996)，頁 70-76。

¹⁵ 翁佳音、陳怡宏譯，《平埔蕃調查書》，頁 68。

¹⁶ 翁佳音、陳怡宏譯，《平埔蕃調查書》，頁 59。

¹⁷ 翁佳音、陳怡宏譯，《平埔蕃調查書》，頁 134。

看，二戰以後平埔原住民不再作為戶口登記、調查與統計的身分類別。因此，1905-1945 年是臺灣史上唯一能夠確實統計平埔原住民與漢人之間通婚率的年代，而且空前絕後。本文的第一個目標，就是運用這段期間的人口統計與戶口檔案來解開這個謎題：平埔原住民與漢人相互通婚的普遍程度為何？

由於二戰以後平埔原住民不再作為調查與統計的分類範疇，當代族群通婚研究或分析福佬、客家、外省三種漢人群體間的通婚，¹⁸ 或分析**法定**原住民與漢人之間通婚，¹⁹ 但都看不見平埔原住民。然而，「漢人普遍與平埔族通婚」已成為目前臺灣民族主義一個流派的重要主張，在當代社會中引起很多人關切。黃樹仁抱怨「這般重大社會史議題卻在學界少有討論。」²⁰ 他以邏輯推理的方式得出：歷史上漢人與平埔原住民確有通婚，但不普遍。他缺的是實證。

本文同時由全島層次與村落層次觀察通婚的比率。在全島層次，運用歷年人口動態統計來掌握總體趨勢。在村落層次，藉由 8 個平埔村落的戶口檔案來捕捉各地差異。包括：宜蘭的頂清水，苗栗的新港

¹⁸ 王甫昌，〈光復後臺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初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6（臺北，1994），頁 43-96；巫麗雪、蔡瑞明，〈跨越族群的藩籬：從機會供給觀點分析臺灣的族群通婚〉，《人口學刊》，32（臺北，2006），頁 1-41；謝雨生、陳怡蓓，〈跨族群婚之代間影響與變遷〉，《臺灣社會學刊》，42（臺北，2009），頁 1-53。

¹⁹ 劉千嘉，〈臺灣都市原住民的族群通婚：社會界線的世代差異〉，《人口學刊》，42（臺北，2011），頁 115-153；劉千嘉、章英華，〈2000 年普查資料在臺灣原漢通婚研究之潛力與應用〉，《調查研究》，27（臺北，2012），頁 7-51；劉千嘉、章英華，〈臺灣原住民的族群婚配類型：世代效果、代間傳承與族群差異〉，《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39（臺北，2018），頁 77-121。

²⁰ 黃樹仁，〈沒有唐山媽？拓墾時期臺灣原漢通婚之研究〉，《臺灣社會研究季刊》，93（臺北，2013），頁 5。

社與後壠南社，臺中的岸裡大社，臺南的吉貝耍、番仔田、頭社，屏東的老埤(圖 1)。這些村落涵蓋噶瑪蘭族、道卡斯族、巴宰族、西拉雅族、馬卡道族的原住民，以及他們的漢人鄰居——有福佬也有客家。如此，我們對於通婚的比率可以獲得不同層次、不同區域、不同族別的全面掌握。

(二)通婚受什麼條件影響？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情況下比較容易或不容易發生通婚？彼得·布勞(Peter Blau, 1918-2002)的結構理論指出：群體的人口規模與地理分布決定人們與其他群體互動的機會；相對規模愈小的群體，與其他群體互動的機會愈大，因而愈可能採取族外婚。²¹不過，整體上居於少數的群體若聚集於特定地區，也能在聚集地成為局部多數而降低族外婚比率。²²當代臺灣原漢通婚的研究亦顯示，在原住民人口相對集中的原鄉，原漢通婚比率遠低於都會區。²³由此不難推論，人口居於少數

21 Blau, Peter M., Carolyn Becker, Kevin M. Fitzpatrick, "Intersecting Social Affiliations and Inter-marriage." *Social Forces* 62:3 (Mar. 1984): 585-606; Blau, Peter M., Terry C. Blum and Joseph E. Schwartz, "Heterogeneity and Inter-marria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1 (Feb. 1982): 45-62; Gurak, Douglas T. and Joseph P. Fitzpatrick, "Inter-marriage among Hispanic Ethnic Groups in New York C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4 (Jan. 1982): 921-934; Hwang, Sean-Shong, Rogelio Saenz, Benigno E. Aguirre, "Structural and Individual Determinants of Out-marriage among Chinese, Filipino, and Japanese Americans in California." *Sociological Inquiry* 64:4 (Oct. 1994): 396-414.

22 Kalmijn, Matthijs, "Trends in Black/White Inter-marriage." *Social Forces* 72:1 (Sep. 1993): 119-146.

23 劉千嘉，〈臺灣都市原住民的族群通婚〉；劉千嘉、章英華，〈臺灣原住民的族群婚配類型〉。

的平埔原住民比居於多數的漢人更可能跨族通婚。但在平埔人口集中的地方，平埔原住民跨族通婚的可能性降低、漢人跨族通婚的可能性提高。

除了彼得·布勞的結構理論，本文試圖檢視人類學者鮑梅立扎根於平埔村落所提出的一些說法。鮑梅立詢問吉貝耍、番仔田、頭社當地人的父母與祖父母婚姻情形，問不到任何案例是漢人男性娶平埔女性。²⁴ 平埔男性娶漢人女性的情形也很罕見，她只問到 2 例，都是寡婦再婚。她認為改嫁以及嫁給「番」(savage)在儒家倫理中是雙重的難堪(原文用 immoral)。²⁵ 這種說法暗示，這些漢人寡婦是為了討生活，不得已才改嫁平埔男性。鮑梅立問到的跨族通婚案例，絕大多數(10 例)是漢人男性贅入平埔女性家中。她指出以前漢人男性蔑稱平埔女性「番仔婆」(hoan-a-pho)，正常情況下不願意跟平埔女性結婚。只有那些非常貧窮的漢人男性，因為付不起聘金，娶不到漢人女性，別無選擇之下才會贅入平埔家庭。²⁶

相較於鮑梅立提出的通婚理由是迫不得已、別無選擇，邵式柏(John Shepherd)提出了積極的理由。他說，漢人男性若透過提供勞動力而贅入平埔女性家中，最後可望控制妻子繼承而來的土地。他也認為平埔原住民與漢人的通婚最初完全是單向，皆由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²⁷

鮑梅立的田野工作直到問了纏足之後才獲得突破，因此主張纏足是區分漢人女性與平埔女性的最後標誌。她認為 20 世紀初時，吉貝

²⁴ 這有取樣偏誤的問題。平埔女性一旦嫁到村外的漢人家庭，其子孫就不會被她問到。

²⁵ Brown, Melissa, *Is Taiwan Chinese?* 73, 96.

²⁶ Brown, Melissa, *Is Taiwan Chinese?* 71, 73, 96.

²⁷ Shepherd, John Robert,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386-387.

耍、番仔田、頭社相對於鄰近漢人聚落的差別，只剩下女性不纏足這一點還看得見。²⁸ 1915 年日本統治者禁止纏足，將這個最後標誌移除了。從此，漢人女性與平埔女性沒什麼兩樣，於是漢人男性娶平埔女性、平埔男性娶漢人女性的案例開始增加。²⁹

上述說法可以整理為下列四點：

- (1) 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是最主要的通婚途徑。
- (2) 漢人女性嫁給平埔男性常為寡婦再婚。
- (3) 漢人的纏足風俗阻礙跨族通婚。
- (4) 禁止纏足後通婚率大增。

本文的第二個目標，是藉由 8 個平埔村落的戶口檔案來檢視上述說法是否具有普遍性。³⁰ 鮑梅立曾經造訪的吉貝耍、番仔田、頭社，也在這 8 個村落當中。在開始分析之前，有必要充分考慮戶口檔案的性質，並回顧相關的統計與研究。

二、戶口檔案的性質與相關統計

(一) 制度及其意涵

1905 年，臺灣總督府以「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的名義，舉行臺灣史上首次人口普查。日本官僚參考西方帝國在普查中區分「種族」的作法，結合臺灣傳統的人群分類，決定藉由普查區分臺灣住民的「種族」為：福建人、廣東人、其他漢人、熟蕃、生蕃。其中，福建人、

²⁸ Brown, Melissa, *Is Taiwan Chinese?* 67.

²⁹ Brown, Melissa, *Is Taiwan Chinese?* 95.

³⁰ 也許 Brown 無意將其所見所聞推廣至更大範圍。不過檢視其見聞的普遍性，還是能增進我們對於原漢關係的理解。

廣東人大致相當於福佬與客家之分。³¹ 臺灣原住民原稱「番」，但這個字在日文中有其他意思，因此加上草字頭，變成「蕃」。這次普查以 10 月 1 日為基準日，但調查員不是 10 月 1 日才開始挨家挨戶對那些可能語言不通的人們做分類。日本官僚設計一套獨特的調查方法：以警察掌管的「戶口調查簿」為底本，透過地方頭人(保正、甲長)協力，事先將調查結果記在上面。正式調查時，調查員只要核對戶口調查簿的資訊是否符合 10 月 1 日的狀態即可。³² 調查結果為：福建人 2,492,784 人、廣東人 397,195 人、其他漢人 506 人、熟蕃 46,432 人、行政區生蕃 36,363 人。³³

調查工作完成後，總督府更新戶口調查簿格式，將普查項目內化為固定欄位；普查結果也重新謄錄到新簿上。從此，戶口調查簿有了「種族欄」：福建人、廣東人、其他漢人、熟蕃、生蕃分別註記為福、廣、漢、熟、生。³⁴ 除了 1905 年 10 月 1 日的人口靜態，政府還需要掌握那天之後的人口動態。因此，總督府規定自 10 月 1 日起，任何人口異動事件(包括結婚)都得在事發 10 日內向警察申報，並登記於戶口調查簿之上。³⁵ 而 1905 年 10 月 1 日以後出生者的種族別，原則上繼承父親，父不詳時繼承母親。³⁶

³¹ 從字面上來看，福建與廣東是省籍之分。但實務上，日本人主要藉由語言區分人群。「種族」雖挪用福建、廣東的稱呼，但意涵轉化為語言群體，不再是字面上的省籍。見：葉高華，〈臺灣歷次語言普查回顧〉，《臺灣語文研究》，13:2(新竹，2018)，頁 253-255。

³² 王學新，《日據時期戶口調查史料選編》(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4)，頁 71-72。

³³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全島之部)》(臺北：該部，1907)，頁 1。

³⁴ 臺灣總督府，《府報》，1887(臺北：臺灣總督府，1905)，頁 92。

³⁵ 臺灣總督府，《府報》，1831(臺北：臺灣總督府，1905)，頁 44-50。

³⁶ 臺灣總督府，《府報》，1887(臺北：臺灣總督府，1905)，頁 92。

1935年，戶口制度略有調整；戶口調查簿的意義由警察的監管名冊轉型為人民的戶籍證明。因此8月1日以後啟用的新簿，比照日本內地戶籍簿的格式，沒有種族欄。³⁷不過，此次變革並非全面換用新簿。唯有戶主更替(死亡、辭任)時才啟用新簿；戶主若未更替，則繼續使用帶有種族欄的舊簿。即使更換新簿，舊簿仍保存於「除戶簿」中。我們仍可由除戶簿追查許多人的種族別。另一方面，警察持有之「戶口調查副簿」(副本)保有種族欄。同時，熟蕃改稱平埔族、生蕃改稱高砂族。³⁸「熟番」與「平埔番」這兩個稱呼源自不同語境，原先略有差異，但此時正式合而為一，成為同義詞。³⁹也由於警察持有的副本仍然記錄種族，即使1935年8月1日以後啟用的戶口調查簿沒有種族欄，總督府仍可持續統計平埔族人口。

使用這些檔案之前，有些事情必須考慮清楚。首先，1905年進行的種族分類可能將部分清代熟番後裔歸類為漢人。一個確定的例子是，有些竹塹社後裔因為已經客家化，在日治時期登記為「廣」。⁴⁰當這些名目上的漢人與他們的原住民同胞結婚時，就會成為表面上的跨族通婚，導致平埔原住民的通婚率膨脹。因此，根據日治時期戶口資料算出來的通婚率，對平埔原住民而言是**高估**。反過來看，當漢人與隱

³⁷ 臺灣總督府，《府報》，2406(臺北：臺灣總督府，1935)，頁13。

³⁸ 臺灣總督府，《府報》，2406(臺北：臺灣總督府，1935)，頁18-19。

³⁹ 平埔番顧名思義，就是住在平地的原住民。熟番則是位於界內受清政府直接統治的原住民。曾於1821-1824年任理番同知的鄧傳安寫得很清楚：「界內番，或在平地、或在近山，皆熟番也；界外番，或歸化、或未歸化，皆生番也。」見：鄧傳安，《蠡測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1830])，頁1。

⁴⁰ 廖志軒、莊英章，〈新竹地區竹塹社民與客家漢民的互動：竹塹社錢皆只派下客家化的探討〉，收入莊英章、黃宣衛編，《客家移民與在地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8)，頁193-232。

身於漢人名目下的原住民結婚時，表面上不算跨族通婚，這樣會低估通婚率。不過，在人口規模差距懸殊的情況下，後者影響相對微小。

將熟番後裔歸類為漢人的可能性，取決於地方上的人口結構與族群關係。在平埔人口聚集或原漢界線分明的地方，相對不易誤判。如段洪坤小時候的經驗，1970年代吉貝要附近的人仍然消遣吉貝要人是「番仔」。⁴¹直到1990年代，葉春榮在田野中還是可以察覺「葫蘆當地誰是人誰是番，葫蘆地方五、六十歲以上的人還是很清楚，只是不便當面說而已。」⁴²因此，在本文分析的8個平埔村落中，隱身為漢人的問題相對微小。

再者，戶口制度下的種族為父系繼承，與平埔原住民常見的招贅婚有所扞格。倘若一個漢人男性贅入平埔女性家中，所生子女繼承父親的「福」或「廣」標籤。但是這種名目上的漢人從小在平埔社群中長大，成年後很容易再與其他平埔原住民結婚，成為表面上的跨族通婚，導致通婚率膨脹。⁴³如此，按照父系繼承制度算出來的通婚率，對平埔原住民而言又是高估。因應這個問題，本文特別區分「名目通婚」與「狹義通婚」。前者乃直接按照種族欄資訊認定。另外，筆者追溯當事人的尊親屬，將查無平埔血緣的漢人挑出來，稱為「狹義漢人」。狹義通婚專指狹義漢人與平埔原住民的通婚。這些狹義漢人不保證沒有更古早的平埔祖先。只能說，他們在日治時期沒有平埔長輩。他們與平埔原住民的婚姻，是嚴格意義下的跨族通婚。

41 段洪坤，〈當代平埔原住民族運動研究(1993-2012)〉，頁90。

42 葉春榮，〈族群與通婚：一個臺南山區村落的歷史人口學研究〉，《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平埔族群與臺灣社會大型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頁311。

43 如果是漢人女性嫁入平埔家庭，所生子女繼承父親的「熟」標籤。這些子女從小在平埔社群中長大，與他們的標籤是一致的，沒有招贅婚所衍生的問題。

(二)全島統計

嚴格的戶口申報制度建立後，總督府將每一年當中發生的人口異動情形彙整為歷年《臺灣人口動態統計》。從 1905 年到 1938 年，每一年皆有全島各種族間婚配對數的統計。其中，1905 年數據只包含 10 月 1 日申報制度落實以後的三個月。1939 年起，關於種族間婚配對數的統計將平埔族與高砂族合併為一類，因此無法單獨計算平埔族的跨族通婚率。

圖 2 根據 1905-1938 年《臺灣人口動態統計》繪出歷年平埔族(熟蕃)的跨族通婚率，當然，這是名目通婚率。實線是當年結婚之平埔男性配對漢人女性的比率，無論娶妻或入贅；虛線是當年結婚之平埔女性配對漢人男性的比率，無論出嫁或招贅。黑線的婚配對象是福佬人，灰線的婚配對象是客家人。

顯而易見，平埔女性比平埔男性更容易與漢人通婚(兩種虛線皆高於實線)。假如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是最主要的通婚途徑，確實可以看到這種圖案。不過，平埔男性的通婚率只是比平埔女性低一些，並不算稀有。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平埔原住民與福佬人的通婚率有明顯上升趨勢。平埔女性配對福佬丈夫的比率，從世紀初的未滿 20% 提升到 1930 年代的高於 30%；平埔男性配對福佬妻妾的比率，也從未滿 15% 提升到 25% 左右。若將福佬人與客家人合計，則平埔女性的跨族通婚率從未滿 30% 提升到 40% 左右；平埔男性的跨族通婚率從未滿 20% 提升到 30% 左右。

圖 3 從漢人的角度觀察。實線是當年結婚之漢人男性配對平埔女性的比率，虛線是當年結婚之漢人女性配對平埔男性的比率。黑線是福佬人，灰線是客家人。很明顯，只有極低比率的漢人與平埔原住民

通婚：福佬人不到 0.5%、客家人不到 1%。畢竟漢人與平埔原住民的人口規模差距懸殊。當代族群通婚研究一再證實：群體的人口規模愈大，與他者的互動機會愈小，因此通婚率也會愈低（見第一節）。顯然 20 世紀初的臺灣亦是如此。這也意味，跨族通婚可使漢人對平埔社群產生很大影響；反觀平埔原住民對漢人社群的影響是杯水車薪。

（三）平埔村落研究

上述聚合數據(aggregate data)⁴⁴ 幫助我們瞭解整體概況，但無法區分不同婚姻形式(嫁娶或招贅)的差別，也無法追溯有多少漢人擁有平埔血緣。此外，各地情況可能隨著人口結構差異而不盡相同。分析村落層次的戶口檔案，可以進行更細微的觀察。

葉春榮曾整理臺南縣左鎮鄉葫蘆(化名，位置見圖 1)的戶口調查簿。⁴⁵ 當地人口正好是福佬與平埔原住民(西拉雅族)各半。他統計有紀錄的 365 次婚姻中，只有 24 次是跨族通婚，占 6.5%。⁴⁶ 從家庭層次來看，87 戶福佬家庭中，⁴⁷ 只有 6 戶曾娶進平埔女性、4 戶曾招入平埔男性；89 戶平埔家庭中，只有 6 戶曾娶進福佬女性、5 戶曾招入福佬男性。他指出：「漢人之婚姻對象多半來自附近之漢人村落，平埔之婚姻對象則來自附近之平埔村落。一般漢人寧可跟稍遠地方的漢人結

44 指由基層單位向上層加總而成的數據，看不到基層單位的差異。

45 葉春榮，〈族群與通婚：一個臺南山區村落的歷史人口學研究〉，頁 287-323。

46 他將 1905 年 10 月 1 日申報制度實施前的回溯事件也算進來，最早可回溯至 1850 年。附錄的資料顯示有 25 次跨族通婚。

47 原文寫 89 戶，但其中有 2 戶既娶進平埔女性也招入平埔男性，導致總數重複計算。筆者逕自更正。

婚，也不要跟平埔結婚。」⁴⁸ 從葫蘆的情況來看，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算不上是最主流的通婚途徑。

研究村落的戶口檔案有個先天限制：當事人一旦嫁出或贅出村外，就看不到另一半的資料。因此，我們無法像全島統計那樣計算男性通婚率與女性通婚率。這種素材只適合分析婚姻入戶事件，包括娶進妻妾與招入丈夫。我們可以計算平埔男性娶妻的通婚率、平埔女性招贅的通婚率。兩者也可以合計為平埔原住民接受婚入的通婚率。但是，我們不應計算平埔男性贅出的通婚率、平埔女性嫁出的通婚率。勉強統計會有偏誤，因為只算得到同村結婚的案例。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觀察那些與平埔社群住在同一個行政村的漢人鄰居是否娶進或招入平埔原住民。亦即，計算漢人男性娶妻的通婚率、漢人女性招贅的通婚率。兩者也可以合計為漢人接受婚入的通婚率。

邱正略與康豹曾整理南投縣埔里鎮烏牛欄(位置見圖 1)的戶口調查簿，製作關於婚姻與收養的多種交叉表。⁴⁹ 烏牛欄這名稱來自臺中豐原一帶，屬於巴宰族岸裡社群。19 世紀起，中部平埔原住民集體移居埔里盆地，也將原鄉地名帶來移居地。按照上一段討論的思維，筆者將該文「表十九」的數據重新整理為表 1。

在平埔男性娶妻的 173 件婚入事件中，32 件為迎娶漢人女性，占 18.5%。在平埔女性招贅的 70 件婚入事件中，38 件為招贅漢人男性，占 54.3%。由此可見，對平埔原住民而言，招贅的通婚率確實遠高於娶妻(54.3% > 18.5%)。然而，由於嫁娶婚的頻率高於招贅婚，娶漢人女性的次數與招贅漢人男性的次數相差不多(32 : 38)。換言之，跨族通婚絕非只是單向地由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引人注目的是，烏牛欄當

48 葉春榮，〈族群與通婚：一個臺南山區村落的歷史人口學研究〉，頁 312。

49 邱正略、康豹，〈日治時期烏牛欄庄的人口結構與族群關係〉，《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1 (臺北，2011)，頁 89-155。

地漢人的通婚率超過三成，高出全島水平(不到1%)非常多。這無疑與當地人口結構相關。漢人在烏牛欄是少數群體，從表1的事件數就看得出來。這也顯示地方上的情況可以大異於全島層次所見圖像。不過，這些名目漢人當中有多少具平埔血緣，邱正略與康豹沒有追溯。

洪麗完曾整理埔里地區另一個行政村大湳(位置見圖1)的戶口調查簿。⁵⁰大湳這名稱來自臺中新社一帶，同樣隨著平埔原住民移居埔里盆地而被帶過來。近代學界將大湳歸為巴宰族，然而，最近當地人宣揚自己是噶哈巫族。洪麗完的結論是：「大湳庄熟番女性有15.9%與漢人男性聯姻；有12.2%大湳庄熟番男性與漢人女性聯姻。……與鮑梅立約有11.8%的漢人男性與熟番女性結婚數據接近。」⁵¹事實上，鮑梅立的11.8%指的是：在她問到的父母與祖父母婚姻案例中，有11.8%的案例(85例中的10例)是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⁵²亦即分母為所有婚姻案例。洪的算法是以熟蕃男性或熟蕃女性為分母，且將婚入事件與婚出事件混在一起算。⁵³由於分母不同，兩者不能比較。

既然各地情況可能有很大差異，只觀察單一村落面臨侷限。我們也不可能將全國的戶口檔案都納入分析，那不是學者的力量所能及。筆者從中央研究院歷史人口研究計畫蒐集的戶口檔案中，找出8個平埔村落的資料。這些村落跨越不同區域、不同族別、不同人口結構。本文藉由比較這些村落，盡可能捕捉最大變異。

50 洪麗完，〈臺灣邊區族群交流圖像：以萬霧溪流域大湳聚落熟番婚姻關係為例(1834-1946)〉，《東海大學歷史研究集刊》，3(臺中，2017)，頁109-174。

51 洪麗完，〈臺灣邊區族群交流圖像〉，頁145。

52 Brown, Melissa, *Is Taiwan Chinese?* p.73.

53 本文已指出計算婚出事件的問題。由於洪麗完未將夫的種族與妻的種族交叉列表，筆者無法驗算與重新計算。

三、八個村落比較

(一)基本資訊

表2彙整8個村落的基本資訊。最北邊的地點是宜蘭的頂清水庄，於1920年整編為「五結庄頂清水」，相當於今日五結鄉季新村。當地有噶瑪蘭族的加禮宛、婆羅辛仔宛、流流等社，也有清水、社尾、新店等漢人聚落。19世紀中葉以來，加禮宛等社原住民因不堪漢人擠壓，大舉遷往花蓮、臺東地區。⁵⁴到了20世紀，當地平埔原住民所剩不多，按1915年普查為203人。⁵⁵若將周邊的五結、羅東、冬山、蘇澳、壯圍等地涵蓋進來，平埔原住民人口為719人。⁵⁶這個區域的漢人鄰居幾乎都是福佬。

接下來兩個地點是苗栗的道卡斯村落。其中，新港社分為東社與西社，於20世紀初與其附近漢人聚落合編為新港庄。本文的資料僅涵蓋東社與西社，不含新港庄的其他漢人聚落。當地於1920年整編為「後龍庄新港字東西」，相當於今日後龍鎮新民里。新港社是臺灣中北部唯一在原居地維持近千人規模的巨大平埔村落。此外，新港社附近的公司寮庄有個百人規模的南社，是後壠社的一部分。當地於1920年整編為「後龍庄公司寮字南社」，相當於今日後龍鎮龍津里東側。新港社與後壠南社的周邊人口有六成是客家，三成多是福佬。

⁵⁴ 詹素娟、張素珍，《臺灣原住民史平埔族史篇(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72-76。

⁵⁵ 1905年的首次普查並未出版村落層次的種族別統計，故本文引用1915年第二次普查的數據。

⁵⁶ 這個範圍不等於加禮宛等社的傳統領域或生活空間，純粹只是用來描述其周邊人口結構。

第四個地點是臺中的大社庄，於 1920 年整編為「神岡庄大社」，相當於今日神岡區岸裡里與大社里。這裡是赫赫有名的巴宰族岸裡大社所在地。不過，大社原住民多數已遷往埔里，還有一部分遷往苗栗縣三義鄉的鯉魚潭(位置見圖 1)。⁵⁷ 1915 年時，大社僅餘 160 個平埔原住民。即使將周邊的神岡、內埔(后里)、豐原、潭子、大雅、北屯、石岡等地涵蓋進來，平埔原住民人口也僅有 215 人，相當稀少。這個區域的人口有近七成是福佬、三成是客家。

接下來三個西拉雅村落就是鮑梅立曾經造訪的吉貝耍、番仔田、頭社。吉貝耍庄於 1920 年整編為「番社庄吉貝耍」，目前是東山區東河里。吉貝耍原住民主要是蕭壠社後裔。番仔田庄於 1920 年整編為「官田庄番仔田」，目前稱為隆田。番仔田原住民是麻豆社後裔，本身人口不多，但周邊區域仍有上千平埔人口。頭社庄於 1920 年整編為「大內庄頭社」，目前是大內區頭社里。頭社原住民主要來自目加溜灣社，也有部分來自西拉雅四大社的其餘三社(新港、麻豆、蕭壠)。⁵⁸ 以上三個西拉雅村落的漢人鄰居幾乎都是福佬。

最南邊的地點是屏東的老埤，於 20 世紀初與附近的中林(平埔聚落)、下浮圳(福佬聚落)合編為老埤庄；1920 年整編為「內埔庄老埤」。本文使用的戶口檔案僅涵蓋老埤本部落，即現在的內埔鄉老埤村。老埤原住民主要來自下淡水社，目前分類為馬卡道族。老埤本身就擁有上千平埔人口。若加上周邊的內埔、萬巒、竹田、長興(長治、麟洛)等地，平埔原住民人口超過四千，占總人口 9%。如此雖然仍是少數群體，但在 8 個研究地點中最具人口優勢。這個區域的人口有七成是客家，兩成多是福佬。

57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東京：富山房，1909)，頁 69。

58 潘英海，〈聚落、歷史、與意義：頭社村的聚落發展與族群關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7 (臺北，1994)，頁 89-123。

(二)各地通婚率

表 3 統計各地平埔原住民接受婚入的事件，先不區分是娶妻或招贅。以新港社為例，在 404 件婚入事件中，分別有 72 件與 37 件的入戶者屬福佬、客家，合占 27.0%，即名目通婚率。再者，72 名福佬人中有 4 人為通婚後代，37 名客家人中有 1 人為通婚後代。若扣掉這 5 名混血者，狹義通婚率為 25.7%。

表 3 有三點值得注意。首先，雖然新港社、後壠南社、老埤的周邊人口以客家居多，但這三社原住民顯然更親近福佬，較常與福佬通婚。第二，能追出平埔血緣的漢人不多；吉貝要與老埤算是比較多的。扣除有平埔血緣的漢人後，吉貝要原住民的跨族通婚率由名目上的 35.8%調整為 29.5%；老埤原住民由 34.8%調整為 28.3%。第三，後壠南社、岸裡大社的原住民具有相當高的通婚率(超過七成)，但其他平埔原住民的狹義通婚率皆未滿三成。

洪麗完曾指出岸裡大社原住民以族內婚為主。⁵⁹ 從戶口資料來看，20 世紀初的情況已經不是那樣。另一方面，據說道卡斯新港社原住民總是強調「娶自己人、嫁自己人」，⁶⁰ 這說法也稍嫌誇大。實際上，1905-1945 年間新港社原住民約有四分之一婚入事件接受沒有平埔長輩的漢人。當然，這樣的比率相較於其他平埔村落算是低的。對照 1909 年關於新港社的報導：「道光年間(1821-1850)尚嚴禁與外族通婚及收養

⁵⁹ 對於發生年代，洪麗完語帶含糊。從上下文判斷，似乎是指清代。見：洪麗完，〈大社聚落的形成與變遷(1715-1945)：兼論外來文化對岸裡大社的影響〉，《臺灣史研究》，3:1 (臺北，1996)，頁 84。

⁶⁰ 湯慧敏，《再見道卡斯：苗栗縣後龍鎮新港東、西社之調查研究》(苗栗：苗栗縣政府，1998)，頁 71。

關係，不准外族進入，然隨著與漢人之間交通接觸頻繁，雖少有背叛者，但社會制裁已稍見緩和，有默許之傾向。」⁶¹

進一步比較平埔人口規模與通婚率的關係(圖4)。在後壠南社、岸裡大社這兩個規模太小的社，多數平埔原住民與漢人通婚。不過，在頂清水與番仔田，即使平埔原住民人口少，仍然維持比較明顯的原漢界線。當然，人們不會只找同村的人結婚，也會到周邊區域尋找婚配對象。即使本村同族人口不足，周邊可能有足夠外援。因此，讓我們繼續觀察周邊區域平埔人口規模與通婚率的關係(圖5)。周邊區域的界定載於表2，大約是步行可以當日往返的範圍。這並不是說，平埔原住民只在這個範圍內尋找婚配對象。毋寧是，若這個範圍內的同族人口愈少，就得到更遙遠的地方才找得到同族的適婚對象。如此，維持族內婚更不容易。顯而易見，本身人口規模太小的岸裡大社，在周邊區域也缺乏足夠外援，這可能是難以維持族內婚的原因之一。反觀番仔田雖然本身人口規模小，但周邊區域有不少平埔原住民，得以保持相對低的跨族通婚率。

後壠南社的情況引人注目。其周邊的平埔原住民不算少，尤其附近就有一個規模巨大的新港社。然而，後壠南社原住民卻不常與其周邊的平埔原住民婚配。在有紀錄的40年間，後壠南社與新港社之間只締結3對夫妻！包括1位新港社女性嫁到後壠南社、2位後壠南社女性嫁到新港社。清代這兩社同屬後壠社群，但20世紀初時似乎不屬於同一個婚姻圈。何以如此，有待進一步探究。

表4切換至漢人鄰居的角度，統計各地狹義漢人(排除有平埔血緣者)接受婚入的事件。頂清水、岸裡大社的漢人占有口優勢(可比較表3、表4的事件數)，即使緊鄰平埔原住民，通婚率並沒有比全島水平高多

⁶¹ 翁佳音、陳怡宏譯，《平埔蕃調查書》，頁59。

少，僅 1% 左右。岸裡大社出現不對稱情形：平埔原住民通婚率相當高(70%)，但同村漢人通婚率極低(1%)。只有在平埔村落中不具人口優勢的漢人，明顯比大多數漢人更可能婚配平埔原住民。新港社、吉貝耍漢人在村中居於絕對少數，其通婚率高於全島水平甚多。吉貝耍甚至有一半漢人接受平埔原住民婚入。老埤漢人的通婚率也相對高，與前述埔里烏牛欄的漢人一樣超過三成。

整體而言，雖然各地通婚率差異頗大，仍有一定規律可循。在地方上相對人口規模愈小的群體，無論是漢人還是平埔原住民，通常愈能接受跨族通婚。

四、檢視鮑梅立的四個說法

(一)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是最主要的通婚途徑？

鮑梅立在吉貝耍、番仔田、頭社問到的 12 例父母或祖父母跨族通婚案例中，有 10 例是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因此她主張跨族通婚大多經由這種途徑。她的取樣有沒有偏誤？這種說法具有普遍性嗎？本文藉由 8 個村落的母體資料加以檢驗。

表 5 按婚姻形式將婚入事件分成四塊：左上部是平埔男性娶妻、右上部是平埔女性招贅、左下部是狹義漢人男性娶妻、右下部是狹義漢人女性招贅。上半部的數據合計等於表 3，下半部的數據合計等於表 4。首先比較左上部與右上部。除了頂清水以外，各地平埔原住民招贅的通婚率確實高於娶妻。不過，由於娶妻的頻率高於招贅，除了番仔田以外，「平埔男性娶漢人女性」的次數都多於「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包括鮑梅立造訪的吉貝耍、頭社也是如此。顯然，平埔男性娶漢人女性不像鮑梅立說的那麼罕見。

表 5 下半部從漢人鄰居的角度觀察。鮑梅立問不到的「漢人男性娶平埔女性」事實上是存在的，包括她曾造訪的三個地點(吉貝要、番仔田、頭社)。在頂清水、頭社、老埤，其發生次數還多於「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5 > 3; 22 > 18; 50 > 16)。總而言之，跨族通婚絕非只是單向地由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

我們不能排除，這種說法指的是「一開始」的樣子。而表 5 數據涵蓋 1905-1945 年的婚入事件。也許後期才興起「平埔男性娶漢人女性」、「漢人男性娶平埔女性」，且在數量上蓋過早期的「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為此，表 6 再將婚入事件分為 1905-1925、1926-1945 兩個時期比較。如此切分的方便理由是將 40 年均分為兩半。另一方面，鮑梅立主張纏足被禁後跨族通婚率大增。纏足通常於女孩 5 歲左右開始執行。⁶² 1915 年禁止纏足時，還沒開始纏足的世代約於 1926 年起進入婚姻市場。如此切分，也方便後頭檢視鮑梅立的這項主張。

如表 6 所示，前期三個西拉雅村落(吉貝要、番仔田、頭社)「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的次數確實超過「平埔男性娶漢人女性」(31 > 21; 7 > 3; 17 > 14)，但後者也不是沒有。到了後期，招贅婚在三個西拉雅村落的確衰微了。其他村落的跨族通婚在前期已是「平埔男性娶漢人女性」居多。在老埤，「漢人男性娶平埔女性」也早就比「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還要常見(26 > 7)。

總而言之，20 世紀初的西拉雅村落比其他平埔村落盛行「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但並非占壓倒性多數的通婚途徑。如果繼續往前推到 19 世紀、甚至更早之前，會不會像邵式柏所言：「最初完全是單向的，都是由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⁶³ 很遺憾，20 世紀的戶口資

62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漢譯戶口調查記述報文》(臺北：該課，1909)，頁 232。

63 Shepherd, John Robert,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料不能回答 19 世紀以前的問題。

(二) 漢人女性嫁給平埔男性常為寡婦再婚？

鮑梅立認為漢人女性嫁給「番」是不名譽的事情，通常是寡婦才這樣做。她的弦外之音是：這些寡婦迫於生計，不得不然。這種說法具有普遍性嗎？

表 7 統計那些嫁給平埔男性的漢人女性是第幾次結婚。顯而易見，他們大多是初婚。初婚的女性當然不會是寡婦。鮑梅立造訪的古貝耍、番仔田、頭社也是如此。她只是剛好問到寡婦再婚的案例，不代表整體趨勢。

(三) 漢人的纏足風俗阻礙跨族通婚？

鮑梅立的田野工作一開始遭遇困境，人們不願意跟她講「平埔番」的事情。直到她無意間問了纏足，才突破人們的心防，抓到訪談要領。因此，她極力強調纏足的作用，主張纏足是區分漢人女性與平埔女性的標誌；那些大腳女性一望可知是原住民，因此漢人不願意娶。這種說法首先面臨的考驗是，漢人群體的內部就有很大的歧異，不一定都會纏足。⁶⁴ 如此，纏足作為界線不只劃在漢人與原住民之間，也會劃在漢人群體之內。顯然，纏足不足以作為劃分漢人與原住民的決定因素。不過，我們不能排除纏足的影響是一種機率論。也就是說，漢人纏足可能降低其與平埔原住民通婚的機率。這可反映在兩個層次上：不同村落之間，愈盛行纏足的村落具有愈低的通婚率；村落之內，家裡有

Frontier 1600-1800, 387.

⁶⁴ 葉高華，〈當纏足遇上天然足：族群融合與社會壓力〉，《民俗曲藝》，197（臺北，2017），頁 107-133。

纏足慣習的漢人比沒有纏足慣習的漢人更少接受平埔媳婦。本文進一步檢視這兩種相關性是否存在。

表 8 針對狹義漢人男性娶妻的案例，分成婆婆(男方母親)纏足與婆婆不纏足兩部分進行統計。由於有些案例追查不到婆婆的資訊，因此表 8 的總數少於表 5 左下部。首先比較村落之間的差異。頂清水的漢人婆婆大多纏足，岸裡大社的漢人婆婆不纏足居多。然而，他們接受平埔媳婦的機率差不多一樣低。纏足區隔說對於解釋這一點無能為力。對纏足區隔說更殘酷的打擊是，在頂清水與岸裡大社，纏足的婆婆都比不纏足的婆婆更可能接受平埔媳婦($1.4\% > 0.0\%$; $3.4\% > 0.3\%$)，雖然機率很低。

只有新港社、後壠南社、吉貝耍、頭社的漢人娶妻符合纏足區隔說的預期：家有大腳婆婆比家有小腳婆婆更可能娶進平埔媳婦。不過吉貝耍、頭社的事件太少，難以排除是隨機事件下的差異($p > 0.05$)。總而言之，纏足與跨族通婚的關連很弱，更不具普遍性。如同葉春榮所言：「纏足不像罐頭上的標籤隨時可以撕掉。」⁶⁵ 只要人們有意區隔彼此，總是能夠找到辦法。

(四) 禁止纏足後通婚率大增？

從全島統計來看，平埔原住民婚配漢人的比率隨時間遞增(圖 2)。鮑梅立更指出，日本統治者禁止纏足以後，漢人女性與平埔女性難以分辨，於是通婚率大幅增加。筆者認為，即使通婚率隨時間遞增，不一定可以歸因於禁止纏足。同一時間發生的事情太多了：交通發達、教育普及，都可能促進漢人與平埔原住民之間的交流。令人納悶的是，從表 6 的狹義通婚率來看，根本看不到普遍而一致的增加趨勢。

⁶⁵ 葉春榮，〈族群與通婚：一個臺南山區村落的歷史人口學研究〉，頁 311。

表 9 將表 6 的「平埔男娶妻」與「平埔女招贅」合併，並比較名目通婚率與狹義通婚率的差異。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早期兩種算法的差異很小。到了後期，名目通婚率膨脹，後壠南社、吉貝耍、頭社、老埤尤其明顯。這是因為早期經由招贅的通婚產生一些在平埔社群中長大的名目漢人，這些人成年後又與平埔社群的同胞結婚，成為表面上的跨族通婚。名目通婚率算進這種情況，而狹義通婚率排除這種情況。因此到了後期，兩者差異擴大。

第二，無論何種定義，新港社、後壠南社、岸裡大社、番仔田等地原住民的跨族通婚率，到後期反而下降了。吉貝耍、頭社則呈現名目通婚率上升、狹義通婚率下降的情形。老埤的名目通婚率大幅提昇，但狹義通婚率只增加一點點。若將 8 個村落合計，也呈現名目通婚率上升(32.4%→34.0%)、狹義通婚率下降(31.1%→27.1%)。這不禁使人質疑：全島統計所呈現的通婚率遞增，不一定反映實質的跨族通婚增加。那很可能只是父系繼承的戶口制度與平埔原住民常見的招贅婚不一致，製造表面上的跨族通婚，導致名目通婚率膨脹。

如果我的推論正確，直到 1945 年，平埔原住民婚配漢人(查無平埔血緣者)的比率不像表面上那樣大幅增加。兩者之間婚姻隔閡全面鬆弛，也許是更晚近的事情。李國銘認為是 1960 年代，⁶⁶ 這個說法很有道理。1960 年代的臺灣進入都市化加速階段，⁶⁷ 大量年輕人離鄉前往都市就業。他們可能因此掙脫地方上的族群劃分。

66 李國銘，〈關於屏東平原少數民族的二、三事〉，《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2 (臺北，1992)，頁 63。

67 黃樹仁，〈臺灣都市化程度析疑〉，《臺灣社會學刊》，27 (臺中，2002)，頁 163-205。

五、結論

本文的第一個提問是：平埔原住民與漢人之間互相通婚有多普遍？從全島層次來看，只有極低比率的漢人與平埔原住民通婚：福佬人不到 0.5%、客家人不到 1%。平埔原住民則有三分之一左右與漢人通婚。如此，跨族通婚可使漢人對平埔社群產生很大影響；平埔原住民對漢人社群的影響卻是杯水車薪。不過，由於各地人口結構與族群關係迥異，地方上的情況可能大異於全島層次所見圖像。從村落層次來看，各地通婚率差異很大，但仍有一定規律可循。在地方上相對人口規模愈小的群體，無論是漢人還是平埔原住民，通常愈能接受跨族通婚。換言之，只有那些在平埔村落中成為少數群體的漢人鄰居們較常與平埔原住民通婚。一旦出了平埔村落，就不是那麼一回事。黃樹仁如此推論：「除了有強烈利益動機的通事之屬，或生計困難的社會邊緣人，一般漢人男性未必願意忍受被人歧視訕笑而與原住民女性通婚。原漢通婚並不像一般想像的容易或普及。」⁶⁸

第二個提問是：通婚受什麼條件影響？彼得·布勞的結構理論可以穿越時空限制，解釋工業化之前的臺灣社會。如同前述，群體的人口規模愈小，與他者的互動機會愈大，通婚率也會愈高。本文也發現鮑梅立提出的四個說法不具普遍性。這不是說她的所見所聞不正確，只是不代表多數情況。從不同區域、不同族別的 8 個平埔村落來看：

- (1) 雖然在許多村落，平埔原住民招贅時比娶妻時更可能與漢人通婚。但娶妻的次數多於招贅，因此通婚並非只是單向地由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

⁶⁸ 黃樹仁，〈沒有唐山媽？拓墾時期臺灣原漢通婚之研究〉，頁 33。

- (2) 嫁給平埔男性的漢人女性大多是初婚。
- (3) 纏足與跨族通婚的關連很弱，更不具普遍性。
- (4) 父系繼承的戶口制度製造表面上的跨族通婚，導致名目通婚率隨時間膨脹。直到 1945 年，平埔原住民婚配漢人的實質比率不像表面上那樣明顯增加。

請謹記在心，本文的結論適用於 1905-1945 年。本文所稱平埔原住民，都是經由日本統治者認定，似乎沒有百分之百涵蓋清代熟番後裔。如竹塹社的案例，若干清代熟番後裔隱藏在日治時期戶口制度的漢人名目下。⁶⁹ 如果這種情況愈常發生，根據戶口資料計算平埔原住民的跨族通婚率就會高估愈多。不過，在平埔人口聚集的村落，原漢分界相對清楚，上述問題相對微小。

1946 年以後，「平埔族」、「熟蕃」等標籤徹底消失於戶口登記中。隨著 1960 年代加速的都市化浪潮，又有大量平埔後裔離鄉前往都市定居，使其平埔淵源隱形甚至遺忘。從此，平埔後裔與漢人通婚勢必更為容易。由於再也沒有資料能夠計算其通婚率，「普遍通婚」的說法獲得很大想像空間，難以否證，並在 1990 年代以後成為部分臺灣民族主義者的重要主張。直到 2018 年，內政部戶政司全面清查 1905-1945 年「熟」註記者的後代子孫名單。2021 年，原住民族委員會在關於平埔原住民身分的憲法訴訟案中公開上述結果：目前全臺灣有 98 萬 1641 人至少擁有一位「熟」註記的祖先。⁷⁰ 這是最寬鬆條件下的數字，也只占總人口 4%。如此看來，至少 20 世紀以後，實在是沒有那麼多平埔原住民可以與漢人通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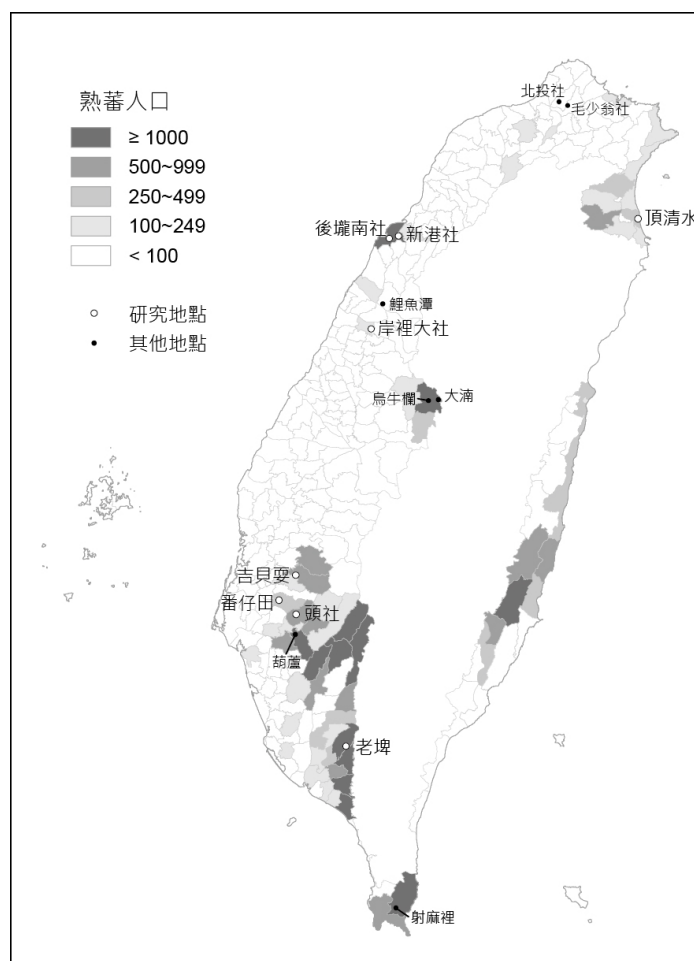
⁶⁹ 廖志軒、莊英章，〈新竹地區竹塹社民與客家漢民的互動〉，頁 193-232。

⁷⁰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綜字第 1100067226 號〉(2021)。

(本文於 2022 年 3 月 1 日收稿；2022 年 11 月 10 日通過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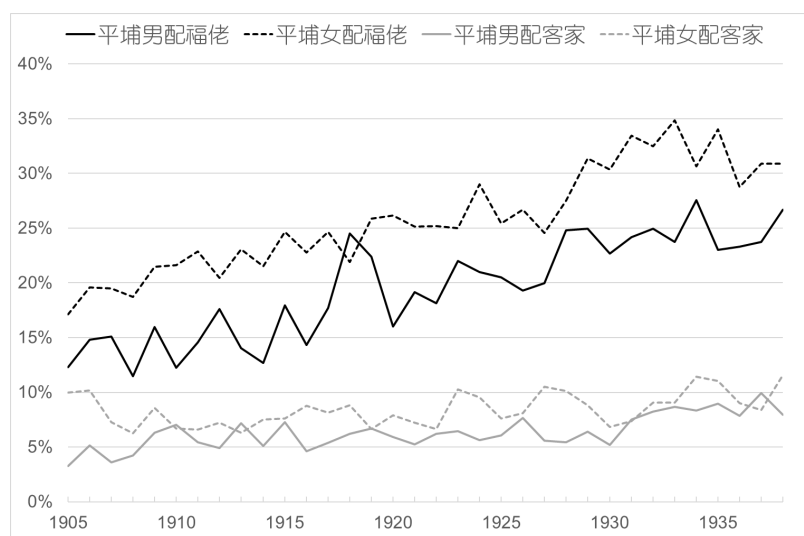
* 本研究獲得科技部補助(計畫編號 MOST 109-2410-H-110-025-MY3)，並由中央研究院歷史人口研究計畫提供戶口檔案。作者由衷感謝潘英海教授與莊英章教授以敏銳的眼光蒐集這些檔案；助理楊凱喬以無比的細心與耐力將原始檔案的毛筆字編碼為可供分析之數據；黃郁麟先生協助串接結構複雜的資料；簡史朗博士與段洪坤先生不厭其煩教導筆者關於平埔村落的背景知識。

圖 1 1915 年熟蕃(平埔族)人口與本文提及之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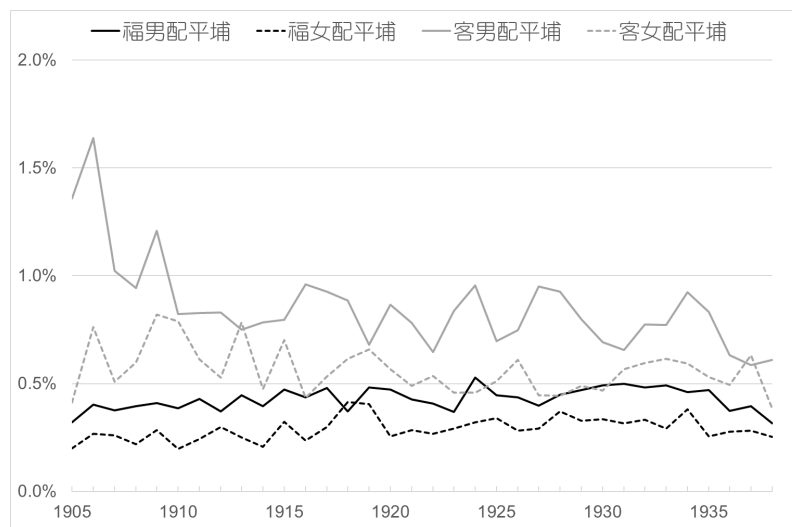
人口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概覽表》(臺北：該部，1917)。

圖2 歷年平埔族(熟蕃)之名目通婚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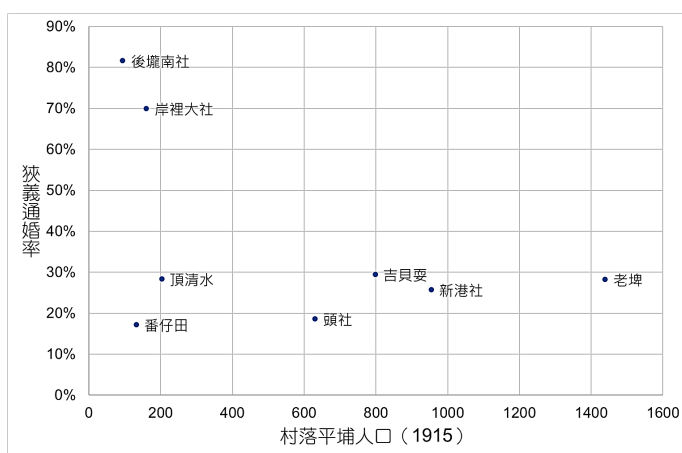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歷年《臺灣人口動態統計》

圖3 歷年漢人之名目通婚率



資料來源：歷年《臺灣人口動態統計》

圖 4 村落平埔人口與通婚率的關係



註：受限於人口統計單位，老埤人口包含中林約 200 人，但通婚率計算不包含中林。

圖 5 區域平埔人口與通婚率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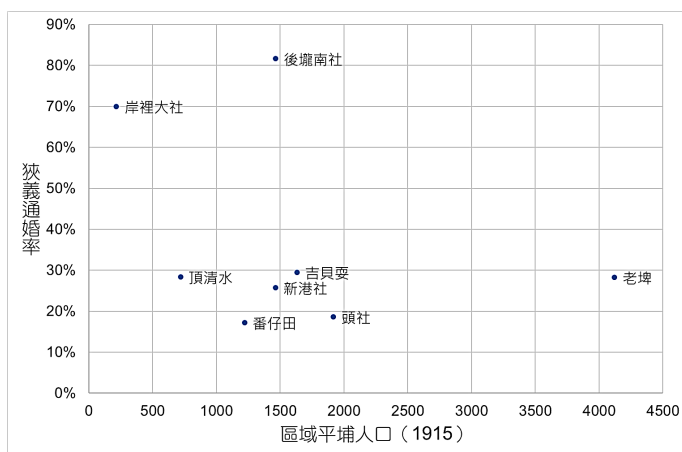


表 1 埔里烏牛欄婚姻入戶事件統計

婚姻形式	入戶者			事件數	名目通婚率
	平埔	漢人	生蕃		
平埔男娶妻	140	32	1	173	18.5%
平埔女招贅	32	38	0	70	54.3%
漢男娶妻	32	49	0	81	39.5%
漢女招贅	8	17	0	25	32.0%

註：省略缺乏種族資訊者。娶妻含大婚、小婚、妾婚，招贅含招婿、招夫。

資料來源：整理自邱正略、康豹，〈日治時期烏牛欄庄的人口結構與族群關係〉，頁 133。

表 2 研究地點基本資訊

地點	清代舊社	分類	平埔人口1915		區域人口結構1915			區域範圍
			本身	區域	平埔	福佬	客家	
五結庄 頂清水	加禮宛社、 婆羅辛仔宛 社、流流社	噶瑪蘭	203	719	1.2%	98.0%	0.9%	五結、羅 東、冬山、 蘇澳、壯圍
後龍庄 新港字 東西	新港社	道卡斯	954	1,462	3.1%	36.9%	60.0%	後龍、造 橋、頭屋、 苗栗、四湖
後龍庄 公司寮 字南社	後壠社	道卡斯	94	1,462	3.1%	36.9%	60.0%	後龍、造 橋、頭屋、 苗栗、四湖
神岡庄 大社	岸裡大社	巴宰	160	215	0.3%	69.2%	30.5%	神岡、內 埔、豐原、 潭子、大 雅、北屯、 石岡
番社庄 吉貝要	蕭壠社為主	西拉雅	798	1,632	2.4%	96.1%	1.5%	番社、柳 營、新營、 後壁、白 河、六甲
官田庄 番子田	麻豆社	西拉雅	132	1,220	1.6%	98.3%	0.0%	官田、麻 豆、下營、 六甲、大 內、善化、 柳營
大內庄 頭社	目加溜灣社 為主	西拉雅	630	1,915	5.4%	94.6%	0.0%	大內、官 田、善化、 山上、玉井
內埔庄 老埤	下淡水社 為主	馬卡道	1,439*	4,120	9.0%	21.0%	70.0%	內埔、萬 巒、竹田、 長興

註：區域約為 10 公里範圍，僅用來描述周邊人口結構，不等於社域。

*包含中林約 200 人。

人口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1917)

表 3 平埔原住民接受婚入事件統計

地點	入戶者							事件數	與漢人通婚率	
	平埔	名目		狹義		混血	其他		名目	狹義
		福	客	福	客					
頂清水	48	19	0	19	0	0	0	67	28.4%	28.4%
新港社	294	72	37	68	36	5	1	404	27.0%	25.7%
後壠南社	8	32	9	31	9	1	0	49	83.7%	81.6%
岸裡大社	20	31	18	31	18	0	1	70	70.0%	70.0%
吉貝要	194	105	3	86	3	19	0	302	35.8%	29.5%
番仔田	53	11	0	11	0	0	0	64	17.2%	17.2%
頭社	199	59	0	48	0	11	0	258	22.9%	18.6%
老埤	187	87	14	68	14	19	2	290	34.8%	28.3%

註：其他為新港社 1 名中國人、岸裡大社 1 名日本人、老埤 2 名生蕃
資料來源：根據戶口調查簿計算

表 4 狹義漢人接受婚入事件統計

地點	入戶者				事件數	狹義通婚率
	平埔	狹義漢	混血	其他		
頂清水	7	447	1	1	456	1.5%
新港社	12	32	0	0	44	27.3%
後壠南社	5	48	2	0	55	9.1%
岸裡大社	6	570	0	0	576	1.0%
吉貝要	24	24	0	0	48	50.0%
番仔田	5	38	0	0	43	11.6%
頭社	28	88	5	0	121	23.1%
老埤	65	120	6	1	192	33.9%

註：其他為頂清水、老埤各 1 名生蕃
資料來源：根據戶口調查簿計算

表 5 婚入事件(按婚姻形式分)

接受方	地點	娶妻			招贅		
		狹義通婚	婚入事件數	狹義通婚率	狹義通婚	婚入事件數	狹義通婚率
平埔	頂清水	16	54	29.6%	3	13	23.1%
	新港社	78	342	22.8%	26	62	41.9%
	後壠南社	35	43	81.4%	5	6	83.3%
	岸裡大社	37	55	67.3%	12	15	80.0%
	吉貝耍	53	234	22.6%	36	68	52.9%
	番仔田	4	37	10.8%	7	27	25.9%
	頭社	30	196	15.3%	18	62	29.0%
	老埤	66	243	27.2%	16	47	34.0%
狹義漢人	頂清水	5	374	1.3%	2	82	2.4%
	新港社	8	31	25.8%	4	13	30.8%
	後壠南社	4	47	8.5%	1	8	12.5%
	岸裡大社	6	489	1.2%	0	87	0.0%
	吉貝耍	15	24	62.5%	9	24	37.5%
	番仔田	4	36	11.1%	1	7	14.3%
	頭社	22	92	23.9%	6	29	20.7%
	老埤	50	156	32.1%	15	36	41.7%

資料來源：根據戶口調查簿計算

表 6 婚入事件(按婚姻形式與時期分)

形式	地點	1905-1925			1926-1945		
		狹義 通婚	婚入 事件數	狹義 通婚率	狹義 通婚	婚入 事件數	狹義 通婚率
平埔男娶妻	頂清水	5	33	15.2%	11	21	52.4%
	新港社	42	181	23.2%	36	161	22.4%
	後壠南社	24	27	88.9%	11	16	68.8%
	岸裡大社	29	42	69.0%	8	13	61.5%
	吉貝耍	21	115	18.3%	32	119	26.9%
	番仔田	3	26	11.5%	1	11	9.1%
	頭社	14	108	13.0%	16	88	18.2%
	老埤	33	118	28.0%	33	125	26.4%
平埔女招贅	頂清水	2	8	25.0%	1	5	20.0%
	新港社	21	42	50.0%	5	20	25.0%
	後壠南社	4	4	100.0%	1	2	50.0%
	岸裡大社	9	12	75.0%	3	3	100.0%
	吉貝耍	31	51	60.8%	5	17	29.4%
	番仔田	7	22	31.8%	0	5	0.0%
	頭社	17	45	37.8%	1	17	5.9%
	老埤	7	31	22.6%	9	16	56.3%
狹義漢男娶妻	頂清水	2	185	1.1%	3	189	1.6%
	新港社	4	21	19.0%	4	10	40.0%
	後壠南社	0	25	0.0%	4	22	18.2%
	岸裡大社	4	274	1.5%	2	215	0.9%
	吉貝耍	10	13	76.9%	5	11	45.5%
	番仔田	4	30	13.3%	0	6	0.0%
	頭社	10	40	25.0%	12	52	23.1%
	老埤	26	79	32.9%	24	77	31.2%

註：狹義漢女招贅平埔男的次數少，不再細分。

資料來源：根據戶口調查簿計算

表 7 狹義漢人女性嫁平埔男性(按婚姻次序分)

地點	初婚	再婚	多次婚	事件數	非初婚 占比
頂清水	16	0	0	16	0.0%
新港社	69	8	1	78	11.5%
後壠南社	32	3	0	35	8.6%
岸裡大社	34	2	1	37	8.1%
吉貝耍	48	5	0	53	9.4%
番仔田	4	0	0	4	0.0%
頭社	27	3	0	30	10.0%
老埤	65	1	0	66	1.5%

資料來源：根據戶口調查簿計算

表 8 狹義漢人男性娶妻(按婆婆是否纏足分)

地點	婆婆纏足			婆婆不纏足		
	娶平埔	事件數	狹義 通婚率	娶平埔	事件數	狹義 通婚率
頂清水	4	295	1.4%	0	17	0.0%
新港社	0	2	0.0%	4	14	28.6%
後壠南社	0	16	0.0%	3	23	13.0%
岸裡大社	3	88	3.4%	1	294	0.3%
吉貝耍	3	6	50.0%	5	6	83.3%
番仔田	1	17	5.9%	0	0	-
頭社	12	56	21.4%	4	13	30.8%
老埤	1	3	33.3%	36	106	34.0%

資料來源：根據戶口調查簿計算

表 9 平埔原住民接受婚入的通婚率(按名目、狹義與時期分)

地點	1905-1925		1926-1945	
	名目	狹義	名目	狹義
頂清水	17.1%	17.1%	46.2%	46.2%
新港社	28.3%	28.3%	25.4%	22.7%
後壠南社	90.3%	90.3%	72.2%	66.7%
岸裡大社	70.4%	70.4%	68.8%	68.8%
吉貝耍	33.1%	31.3%	39.0%	27.2%
番仔田	20.8%	20.8%	6.3%	6.3%
頭社	22.2%	20.3%	23.8%	16.2%
老埤	30.2%	26.8%	39.7%	29.8%
合計	32.4%	31.1%	34.0%	27.1%

資料來源：根據戶口調查簿計算

徵引書目

1905-1938 各年度《臺灣人口動態統計》

王甫昌，〈光復後臺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初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6 (臺北，1994)，頁 43-96。

王學新，《日據時期戶口調查史料選編》，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4。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東京：富山房，1909。

巫麗雪、蔡瑞明，〈跨越族群的藩籬：從機會供給觀點分析臺灣的族群通婚〉，《人口學刊》，32 (臺北，2006)，頁 1-41。

李國銘，〈關於屏東平原少數民族的二、三事〉，《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2 (臺北，1992)，頁 57-64。

李筱峰，〈推薦序〉，收入林媽利著，《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臺灣各族群身世之謎》，臺北：前衛，2010。

周婉窈，〈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新」材料與多元詮釋的可能〉，《臺灣風物》，65:2 (臺北，2015)，頁 23-89。

林媽利，《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臺灣各族群身世之謎》。臺北：前衛，2010。

邱正略、康豹，〈日治時期烏牛欄庄的人口結構與族群關係〉，《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1 (臺北，2011)，頁 89-155。

段洪坤，〈當代平埔原住民族運動研究(1993-2012)：以臺南西拉雅族為例〉，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洪麗完，〈大社聚落的形成與變遷(1715-1945)：兼論外來文化對岸裡大社的影響〉，《臺灣史研究》，3:1 (臺北，1996)，頁 31-96。

洪麗完，〈臺灣邊區族群交流圖像：以萬霧溪流域大湳聚落熟番婚姻關係為例(1834-1946)〉，《東海大學歷史研究集刊》，3 (臺中，2017)，頁 109-174。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綜字第 1100067226 號〉，2021。

翁佳音、陳怡宏譯，《平埔蕃調查書》，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

陳叔倬、段洪坤，〈平埔血源與臺灣國族血統論〉，《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2 (臺北，2008)，頁 137-173。

陳叔倬、段洪坤，〈臺灣原住民祖源基因檢驗的理論與統計謬誤〉，《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6 (臺北，2009)，頁 347-356。

- 湯慧敏，《再見道卡斯：苗栗縣後龍鎮新港東、西社之調查研究》，苗栗：苗栗縣政府，1998。
- 黃樹仁，〈臺灣都市化程度析疑〉，《臺灣社會學刊》，27(臺中，2002)，頁 163-205。
- 黃樹仁，〈沒有唐山媽？拓墾時期臺灣原漢通婚之研究〉，《臺灣社會研究季刊》，93(臺北，2013)，頁 1-47。
- 楊南郡譯註，《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臺灣通信〉選集》，臺北：遠流，1996。
- 葉春榮，〈族群與通婚：一個臺南山區村落的歷史人口學研究〉，《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平埔族群與臺灣社會大型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頁 287-323。
- 葉高華，〈當纏足遇上天然足：族群融合與社會壓力〉，《民俗曲藝》，197(臺北，2017)，頁 107-133。
- 葉高華，〈臺灣歷次語言普查回顧〉，《臺灣語文研究》，13:2(新竹，2018)，頁 247-273。
- 詹素娟、張素玢，《臺灣原住民史平埔族史篇(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 廖志軒、莊英章，〈新竹地區竹塹社民與客家漢民的互動：竹塹社錢皆只派下客家化的探討〉，收入莊英章、黃宣衛編，《客家移民與在地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8，頁 193-232。
-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概覽表》，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1917。
-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漢譯戶口調查記述報文》，臺北：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1909。
- 臺灣總督府，《府報》，1831，臺北：臺灣總督府，1905。
- 臺灣總督府，《府報》，1887，臺北：臺灣總督府，1905。
- 臺灣總督府，《府報》，2406，臺北：臺灣總督府，1935。
- 臺灣總督府，《臺灣俚諺集覽》，臺北：臺灣總督府，1914。
- 劉千嘉，〈臺灣都市原住民的族群通婚：社會界線的世代差異〉，《人口學刊》，42(臺北，2011)，頁 115-153。
- 劉千嘉、章英華，〈2000 年普查資料在臺灣原漢通婚研究之潛力與應用〉，《調查研究》，27(臺北，2012)，頁 7-51。
- 劉千嘉、章英華，〈臺灣原住民的族群婚配類型：世代效果、代間傳承與族群差異〉，《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39(臺北，2018)，頁 77-121。
- 潘英海，〈聚落、歷史、與意義：頭社村的聚落發展與族群關係〉，《中央研究院民族

- 學研究所集刊》，77 (臺北，1994)，頁 89-123。
- 鄧傳安，《蠡測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1830]。
-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全島之部)》，臺北：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1907。
- 薛允升著述、黃靜嘉編校，《讀例存疑重刊本》第二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謝雨生、陳怡蓓，〈跨族群婚之代間影響與變遷〉，《臺灣社會學刊》，42 (臺北，2009)，頁 1-53。
- Blau, Peter M., Carolyn Becker, Kevin M. Fitzpatrick, "Intersecting Social Affiliations and Inter-marriage." *Social Forces* 62:3 (Mar. 1984): 585-606.
- Blau, Peter M., Terry C. Blum and Joseph E. Schwartz, "Heterogeneity and Inter-marria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1 (Feb. 1982): 45-62.
- Brown, Melissa, *Is Taiwan Chinese? The Impact of Culture, Power, and Migration on Changing Ident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Gurak, Douglas T. and Joseph P. Fitzpatrick, "Inter-marriage among Hispanic Ethnic Groups in New York C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7:4 (Jan. 1982): 921-934.
- Hwang, Sean-Shong, Rogelio Saenz, Benigno E. Aguirre, "Structural and Individual Determinants of Out-marriage among Chinese, Filipino, and Japanese Americans in California." *Sociological Inquiry* 64:4 (Oct. 1994): 396-414.
- Kalmijn, Matthijs, "Trends in Black/White Inter-marriage." *Social Forces* 72:1 (Sep. 1993): 119-146.
- Shepherd, John Robert,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Intermarriage between the Pingpu and the Han People in Taiwan, 1905-1945

Ko-Hua Yap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prevalence of intermarriage between the Pingpu (plains aborigines) and the Han people between 1905 and 1945 by using the demographic data an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files from eight Pingpu villages. On the island-wide level, only a meagre percentage of Han people intermarried with Pingpu people –below 0.5% among the Hoklo and below 1% among the Hakka. Nevertheless, approximately one-third of the Pingpu people intermarried with Han people. In other words, the Han people were able to exert a disproportionate if not prevailing impact on the Pingpu people due to inter-ethnic marital relations, while the impact of the Pingpu people on the Han people was minuscule. On the village level,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geographical disparity in intermarriage rates, though some patterns can be identified. The smaller the population of the ethnic group was in a locale, the more likely it was to accept inter-ethnic marriages. In other words, inter-ethnic marriages among minority Han living within Pingpu villages occurred at a more significant rate than the island average. This research also examines the factors regarded as contributive to intermarri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Peter Blau's macrostructural theory could explain preindustrial Taiwanese society, but Melissa Brown's four claims are not universal.

Keywords: historical demography, ethnic relation, uxori-local marriage, foot binding